

●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编



喉天学术

LITIAN XUESHU

4

天

學苑出版社

唤天学术

(第4辑)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喉天学术·第四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5077-2874-3

I. 喉… II. 首… III. 文学研究—文集 IV.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13483 号

责任编辑: 洪文雄

装帧设计: 周 毅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yg@sina.com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4055、67675512、67678944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47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 册

定 价: 24.00 元

前 言

《喉天学术》是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编，以中国语言文学研究为主要内容，以在校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为基本作者队伍，面向青年读者的学术性辑刊。

作为主办单位的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已有近 50 年的历史。现有中国语言文学系、高级涉外文秘系、比较文学系、影视文学系，并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三个博士点和多个硕士点。此外，还设有教育部批准的省属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古籍整理研究所、美学研究所、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中心、李贽研究中心、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中国语言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全院承担国家级、部委级及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多项，其科研成果已获得教育部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的多种奖项。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群体、开放性的学术氛围和良好的学术传统，涌现出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高声望的学者，以及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中青年学术骨干，与此同时，研究生教育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研究生质量得到稳步的提高。

为检阅我院研究生的学术成果，为鼓励和引导同学们积极投身科学研究，为加强与兄弟院校及学术界的交流，并希望通过我院同学们的一得之见，推进相关学科的发展与建设，我们特创办《喉天学术》辑刊，每年出版一辑。作者队伍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为主，今后我们也将适当选发兄弟院校研究生的优秀论文。

本刊之所以命名为“喉天学术”，是因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原

有的学生社团多是以“喉天”为名，包括喉天剧社、喉天文学社、喉天诗社等。“喉天”二字本是指仙鹤、鸿雁等鸣禽在辽阔的天空中自由地鸣叫，我们用它来作为这本学术辑刊的名字，意在为同学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境域，同时也是为了强调一种学术自由的精神。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公布他的日心说的时候，曾在扉页上引用了阿尔齐诺斯的一句名言：“一个人要做一个哲学家，必须有自由的精神。”其实不只是做一个哲学家，做一个语言文学研究者，也一样要有自由的精神。有了自由的精神，才可能有健全的、独立的人格，才敢于敞开自己的心扉，不怕世俗的嘲笑和冷眼，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说真话，不去欺世盗名，不去迎合流俗，不去装神弄鬼。有了自由的精神，才能超越传统的认识，摆脱狭隘的思维方式的拘囿，让思维在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中流动，才能调动自己意识和潜意识中的积累，才能有卓尔不群的发现。

《喉天学术》强调自由的精神，同时强调严谨的学风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为使我们培养的研究生适应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为强化他们独立的科研能力，我们注重加强学术环境的营造，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多人来院讲学，让学生打开眼界。我们还制订了研究生课程规划和有关毕业论文写作的措施，对开题报告、论文指导以及论文答辩等环节都提出了比较严格而又切实可行的要求，以不断提高我院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这将会从根本上保证《喉天学术》的学术水准。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科学研究是最富于独创性的精神劳动，愿年轻学子的心灵毫无拘束地在广阔的宇宙中自由遨游，《喉天学术》将成为你们腾飞的踏脚石。

吴思敬

目 录

· 现当代文学 ·

文学社团与出版业的结盟

——试论文学研究会的出版发行策略 李秀萍 (1)

当代新诗症候与文化诗学透视 俞菁慧 (12)

“海派文学”中的“都市职员”

——以穆时英、张爱玲作品为中心 刘媛媛 (26)

魏明伦剧作的语言 张金尧 (48)

· 文 艺 学 ·

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文化观”辨析 王 蓉 (59)

孟子“以意逆志”之现代审视 钟厚涛 (70)

《文心雕龙》中的“骨”字溯源 李 璇 (84)

杜甫文学史观初探 李 颖 (97)

· 古代文学 ·

从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看汉武帝的文学影响 龙文玲 (108)

唐代女诗人李冶其人其诗 张 璐 (118)

论王维的隐逸思想 饶莎莎 (144)

论李益边塞诗的抒情特色 孟若愚 (165)

从诗歌创作看顾瑛的仕隐心态 陈丽芳 (178)

·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

- 梦之于现实主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一种研究 宋振佳 (191)
- 重解闺阁独语——吴江叶氏女诗人女性主义批评 王佳可 (201)

· 语 言 学 ·

- 汉语定中结构实体隐喻研究 王霜梅 (218)
- 汉语早期儿童时间系统获得研究 赵学彬 (232)
- 对现代汉语字母词的社会语言学调查和分析 张华颖 (255)

· 文 秘 学 ·

- 试论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建构 齐振家 (273)
- e时代的博客风潮 李楠 (289)

文学社团与出版业的结盟

——试论文学研究会的出版发行策略

李秀萍

内容提要：通过对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等出版企业之间互动合作关系的分析，尝试清理文学研究会的出版发行策略，认知其对基本机制保障的自觉寻求，同时尝试梳理现代出版业在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产生、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文学研究会 商务印书馆 文学生产 出版 发行

为最大限度还原文学史自身的丰富性，进一步拓宽研究空间，关注文本之外的文学现象，探究文学史形成过程中非文本因素的价值与意义，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又一热点。本着这一立场，反观中国现代文学生产体制的形成，我们发现，现代出版业在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产生、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值得特别关注。

关于出版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有研究者进行过这样的总结：

现代出版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出版与文学互动而生。出版利用技术、资金和发行网络将语言符号的文学作品物化为一种纸质媒介形式，实现向社会的传播，成为一种社会存在物。出版对文学有培育、扶持和推动作用，同时，出版的发展壮大还成为一种文化产业。近代出版的出现以机器印刷技术为基础，以书、报、刊为载体，影响深远、广泛、持久。一般而言，文学作品先由报刊发表，再由出版社出版，文学出版相互依存，密不可分。^①

一些出版社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如商务印书馆、泰东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实力强弱决定着影响程度的深浅,其中,商务印书馆的作用显然是最大的。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文研会)的《小说月报》和文研会丛书系列中的大部分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对现代文学的帮助和推动,主要是通过出版方式开创了一种现代文化,培养了大量的现代文学作家和读者。^②

文研会自成立以来,在规模扩展、影响范围上都远远超出同时期的其他文学社团,甚至名噪一时的创造社也无法望其项背。绵延 11 年之久的存在时间,多种刊物的长期稳定出版,丛书的不断推出,多位知名作家的培养,以及文学理论上的稳健发展,更使它在文学史上得以傲视群雄。这种优势得以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庞大的出版基地的支持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雄厚的资金实力,发达的发行网络使《小说月报》得以维持最长的时间,在新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商务印书馆民营企业的经营形式,也使它保持着较为纯粹的民间色彩,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和舞台。

一、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发行网络

作为民营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诞生和现代经营意识的逐渐形成,都离不开上海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由于租界的存在,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成为全国金融、商贸、交通通讯及工业中心,并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东方第一大港。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它拥有了全国最发达的新闻出版产业,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新文化、新文学刊物——《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季刊》都在上海出版、发行。“新文学在北京兴起之后,其中心地位逐渐为上海所取代,而这一过程的完成,基本是在 20 年代进行的。”^③促成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除了 20 年代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变动和差异外,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社会组织力量的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文化组织作用,是根本原因之一。

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城市，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与文化也随之发生改变。大量人才的涌入，使职员阶层成为书刊市场新的扩大的消费群体，发达的资讯为报刊的信息提供了保证，遍布全国的发行网络延伸了市场，商务印书馆就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④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2月10日，创办者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都是基督徒，毕业于教会学校并且受雇于教会出版社——美华印书馆。1900年，商务印书馆兼并了一家日本印刷厂——修文书局，扩充了设备。1903年，成立编译所，延请参加过百日维新的前清翰林张元济担任所长。张元济的理想在于通过出版扶助教育，开启民智，改造社会，这种志向无疑提升了商务经营活动的文化品位。

商务印书馆创业时资本仅为4000元，因经营有方，到1922年，资本增加到500万。据汪敬虞《中国现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的统计，1913年我国万元资本以上的私营厂矿共549家，总资本为12028万元，平均资本21.5万元。商务当时以150万元的资本总额，成为全国出版界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而旧中国海关的外籍税务司编写的《海关十年报告》中则称它是当时全亚洲最大的出版企业。^⑤其员工最多时达到4000人以上，加上全国各地38处分馆和支店，总人数超过5000人。

20世纪20年代，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与实力的商务印书馆面临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局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出版业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新出版社竞相成立，新出版物不断涌现，商业化与新文化共生互动，使20年代成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但随之而来的也有市场竞争的加剧，商务原有的经营意识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致使期刊的销量逐渐下滑，商务也招致“过于保守”的批评。张元济等人深感：“时事变迁，吾辈脑筋陈腐，亦应归于淘汰”。因此，为摆脱这种不利局面，重新掌握市场主动权，商务开始锐意改革。首先将目光锁定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1921年，商务资深高层人士高梦旦亲自前往北京请来胡适，力邀其担任编译所所长，胡适经过多方调查考虑，最终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1922年1月，王

云五正式上任，担任编译所所长。他推行科学管理，引进大批新人，开启了商务启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新时代。这些重大经营管理政策的调整，对于《小说月报》等期刊及丛书的出版发行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小说月报》的改革就是在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进行的。由于时代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吸引了大批读者，《小说月报》的销量日益下滑，商务印书馆着手对其进行革新，在物色新的编辑人选时，他们看中了年轻有为的茅盾。据他的回忆：“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初，身兼《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主编的王莼农忽然来找我，说是《小说月报》明年起将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学，拟名为‘小说新潮’栏，请我主持这一栏的实际编辑事务。”这种在一个杂志中辟出一个专栏刊登与整个刊物风格迥异的作品的做法持续了一年，显然，这种融新旧于一炉的做法，两面不讨好，既得罪了礼拜六派，也未能吸引新青年，因此，1920年11月，王莼农辞职，茅盾正式担任《小说月报》主编。

《小说月报》革新后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稿源。商务印书馆应允了茅盾提出的摒弃现存全部稿件（主要是礼拜六派的文稿）、赋予主编编辑全权等条件，同时提出：次年一月号的稿子，必须准期出版。这就意味着两星期后必须开始发排工作。茅盾为了解决创作稿件的不足，给之前曾向该刊投稿的王剑三写快信，告知刊物完全革新的消息，请他并约熟人写稿。他当时并不知道王剑三就是新文学作家王统照，很快，他意外地收到了郑振铎的来信，说他和朋友们愿意供稿，并提到他们正在组织一个团体——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为周作人等，邀请茅盾参加。这封信给了茅盾极大的鼓舞，他立即拟写了《本月刊特别启事》五则，说明《小说月报》12卷1号起将完全革新，增加海外文坛消息、文艺丛谈、书报评论等新栏目，其中，启事第五则是排版时临时加入的。《小说月报》11卷11号付印时，文研会发起人名单及宣言、章程等仍在酝酿中。12月中旬，郑振铎寄来文研会宣言、简章、发起人名单和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等人的创作，刚刚赶上12卷第1期最后一批发稿，就将宣言等以附录形式刊出，此即《小说月报》革新及文研会成立的过程。

在这里,值得关注的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1920年11月初,张元济、高梦旦曾在北京与郑振铎等人见面,郑等要求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份新杂志,由他们主编,但张等则希望改组《小说月报》,意见未能统一,郑等表示要先成立文研会,再办新刊物,而张等则回到上海,着手《小说月报》的革新工作。由此可见,在这件事上,商务印书馆掌握着主动权,从根本上决定着刊物的性质和归属。茅盾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改组后的《小说月报》一开始就自己说明它并非同人杂志。它只是出版商的刊物。我任主编也是在演独角戏,稿件去取,只我一人负责。”^⑥

其次,文研会作家的创作解救了《小说月报》革新后的燃眉之急,而《小说月报》也以刊物的形式将文研会作家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主张以文本的形式固定下来,传播出去,使其具有了社会影响力,这是近现代社会报刊与文学之间建立的含有经济因素在内的新型关系的体现。^⑦

这种新型关系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小说月报》的焕发生机,一方面文研会群体新鲜血液的鼎力加盟,使其实现了思想文化意蕴的更新,无论创作还是理论文章都展现着勃勃生气;另一方面,身为现代出版业龙头的商务,以自己雄厚的资金、技术与发行网络,为新文学的生产传播提供了充裕的基础和条件。

陈原在《商务印书馆创业百年随想》中,对商务雄厚的出版发行实力有过这样的描述:

“它不单是一个出版社,而且是一个多媒体。作为主体的出版机构,拥有编译所、发行所和印刷所……它的发行所不但开办了国内和海外几十家分支机构,还有征集了十万订户的通讯现购处;它的印刷所不单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还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和技术力量。”^⑧

注重发展分支机构,扩大发行范围是商务的成功秘诀之一。在开办初期,它就建立了发行所专营批发、零售。开业3年后,着手在各地建立代销处,在各地建立分馆、支馆、分销处,各分支馆都由总馆派人前往经营,听从总馆指挥。

建立一个分支机构就增加一个批零兼营的据点,开拓出一片市场。各分支机构向附近城市的书店发展特约经销处,在批发折扣方面

给予优惠，以便借其他书店的人力、物力和店铺做自己的生意。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自己的发行网络，便于收集市场信息，扩大批发，防止拖滞欠账。它们就近向外地书店批发本版书，并直接向附近各县发行教科书。众多分支机构、代销处的建立，使商务版书籍的发行范围不断扩大，成为商务事业发展的有力支柱。

各大出版机构的决策层都把发行环节视为企业发展的龙头，据《张元济日记》记载，早在民国初期，商务就推行寄售这种形式，而且在每个城市只物色一家书店寄售，防止太多太滥。他在1918年3月和12月的日记中均提到发展特约经销处的具体规定。

张元济还很注重新书预订工作，注意运用这种形式开拓市场，通过预订，让读者分期付款。他在《印行四部丛刊启例》中提及该做法的益处：“既可以出书迅速，使读者先睹为快，亦复分年纳价，使购者置重若轻”，这种做法对当代出版发行工作仍有启发意义。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很注重批发折扣，由《张元济日记》可知，民国初年书籍定价为出版成本的4倍，一般按对折批发。商务版图书在本馆门市零售，可按八折至七折优待读者^⑨，这些举措，对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构成推动，也影响到了以后其他同类企业的运行方式，《小说月报》也曾经学习这种方法，并且享受到了这样规范而发达的发行网络的优势。

商务发行所多采用集中备货的方式，让分支机构勤进勤添。这就把脱销与积压的风险都由发行所来承担，而发行所则采取不断重印，适量备货的办法化解风险。据汪家熔先生统计，1916至1922年商务每年度的销售额与年底存货额的比率，平均为1:1.6，即每销货1元，有1.6元的备货。较为充分的备货，保证了分支机构的添货需要，防止了脱销。为便于对分支机构进行业务指导，保持信息交流的顺畅，商务还先后编印了《同舟》、《馆务通讯》、《通讯录》、《同行月刊》等内部业务刊物，管理的规范可见一斑。

除注重分支机构的建设外，商务总部的组织建设也很规范，四个部所上设有总务处，领导着北京和香港的两个附属印刷厂以及各省的分馆和学校、东方图书馆等附属机构。商务印书馆的本部设在宝山路，那里有管理处和编译所、印刷所和装订部，发行所设在河南路，有自己的出版机构，与遍及全国的36个分馆和1000个以上的销售点

保持着联系。如此庞大的发行网络，使《小说月报》可以拥有全国的影响，甚至延及海外，而这样规模巨大的发行网络对于现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发展，也构成了有力的推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研会借由《小说月报》受益于商务发达的出版发行网络与雄厚的资金技术支持，但是身为商业出版企业的商务，对于胸怀新文学建设宏志的文研会而言，仍有许多的限制和束缚，《小说月报》仍旧要受控于商务印书馆，如在改变刊物名称、刊登广告、主编换人等方面，甚至在刊物内容方面，都要受到制约。因此，文研会一直将《小说月报》视为“代用会刊”，在努力巩固这一影响深远的阵地同时，积极致力于自己的会刊建设，《文学旬刊》的推出，标志着文研会真正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媒介基地。

二、《文学旬刊》的发行策略

《文学旬刊》由1921年5月10日创刊到1929年12月22日第380期终刊，在整整8年7个半月里，除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个多月，以及1929年6—11月内有些脱期外，基本正常按时发行，这在新文学史上也是殊为难能可贵的。

该刊是20年代最重要的小型文学刊物，它创刊时，“中国文艺界里尚未发现过与本刊同性质的出版物。”^⑧与作为文研会“代用会刊”的《小说月报》不同，它公开标明是文研会的机关刊^⑨，从一开始就基本独立，后来脱离《时事新报》后就完全独立了，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月刊相比，它出版周期短，反应快，批评性、战斗性强。20年代初，《文学旬刊》成为文研会进行新文学建设的实践基地，充分体现出刊物灵活自由的特点。文学史上一些著名的论争如：对“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批判，对复古主义的“学衡”派的反击，以及与创造社的论争等，主要都是在该刊上进行的。除了“攻击”之外，还以极为显要的位置刊发了郑振铎提倡“血和泪的文学”，茅盾的《论无产阶级艺术》等理论建设文章，为文研会全面展开自己的文学理想建设提供了极佳的园地。

文研会创办自己的会刊——《文学旬刊》有着鲜明的目的性：开

辟一方真正可以自由实践自身理想的园地。但是作为一个心理颇为成熟稳健的群体，文研会非常注重利用社会资源，为自己的尝试增加成功的砝码和保障，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文学旬刊》具体发行运作方式的选择上。

《文学旬刊》出版和发行的策略选择非常聪明，文研会借鉴了《小说月报》的经验，在初成立时，因为立足未稳，所以选择依附“四大副刊”，意在借助其发达的发行网络，迅速扩大影响，打开知名度，尽快赢得读者和市场。

这里不能不提及当时对新文学运动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影响极为深广的“四大副刊”，它们分别创办于南北两个文化中心，包括北京的《晨报》副刊（《晨报副镌》）、《京报副刊》和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四大副刊’以传播五四新文化著称，副刊上发表的宣传新文化的文章不计其数，这些文章以逻辑判断断述的新文化思想，成为新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域”^⑧，因此，在当时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与深远的影响力。提到“四大副刊”，有一个重要的社团组织不应该被绕过，它就是——“研究系”。

研究系原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中心组成的宪法研究会的简称，起源于立宪时期的宪友会，其主要成员由原进步党骨干组成。而“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指的是在五四前后出现的以梁启超为中心的一批知识分子集团，包括张东荪、张君勱、蒋方震、蓝公武等。他们在新国会出现后跟随从政坛退出的梁启超，在秘密组织——松社的名义下结集起来，筹办《时事新报》、《改造》，以此作为文化资源的基础，高举文化运动旗帜。

研究系诸人已经具备公共领域控制意识，将《晨报》、《时事新报》及1923年张君勱筹办的国立自治学院视为自身的文化据点，这里是汇集知识分子，表述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的空间。他们依靠这些雄厚的文化实力，主倡知识分子的联合与国民运动，努力建构主导话语空间，试图将其转化为政治影响力。

《时事新报》创刊于1907年12月，它的副刊有十余种，内容较为庞杂，每种副刊的特点及出版周期也很不相同，其中，《文学旬刊》与《学灯》影响最广。

《文学旬刊》享有完全独立性，“到100期时，除了附送外，可以单独售卖了”。《时事新报》雄厚的文化实力和政治背景使其在当时拥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力，发行网络也很发达，《文学旬刊》创办之初的确在这些领域受益颇多，因此，不仅很快就在文坛站稳脚跟，而且迅速扩大了自身影响，充分张扬出自己的个性和活力。它的成功创办，使文研会的影响得以进一步扩大，不少地方的文学青年自行组织了分会，效仿《文学旬刊》的发行办法，将他们办的周刊、旬刊附在各地的日报内，如在广州的会员也创办有《文学旬刊》，附于广州的《民国日报》，改为《文学周报》后仍随报附出。此外“又有许多周刊旬刊附在各地日报内，而这周刊旬刊又标明某处文学研究会分会主编的字样……这一切是文研会同人的‘各自的行动’，并没有总机关在那里有计划地布置。”^⑩例如天津的《民意报》，1923年曾经附出一种《微笑周刊》，标明是冀县六师文学研究会主编……对于这种盛况，茅盾后来分析说：“我们的‘名气’的扩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得力于商务印书馆和《时事新报》遍及全国的发行网，老板要赚钱，也就连带替我们扩大了影响。”^⑪

文研会创办的《文学旬刊》一度分为南北两种，附刊于《时事新报》的是上海的《文学旬刊》，另有一份北京的同名刊物附刊于《晨报》副刊。由于对社会文化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晨报》副刊在当时保持着对思想界和文艺界的广泛影响，是五四时期最负盛名的报纸副刊，位列“四大副刊”之首。北京的《文学旬刊》选择附送于《晨报》副刊，无疑可以最为迅速地扩大自身影响。

虽然对于晨报具体的发行状况在今天已经难以查证，但杨义在《中国新文学图志》中介绍《京报副刊》时曾提到：“当时《京报》发行量仅为《晨报》的一半，每日约三、四千份”^⑫，由此可以推论，《晨报》当时日发行量可达八千份，这在当时无疑是十分可观的。

附送于《晨报》副刊的《文学旬刊》成为文研会在北京的主阵地，该刊立足文研会基本主张并对新文学其他流派持宽容态度，重视创作并强调文艺批评的重要性。先后发表了周作人的《艺术与道德》、鲁迅的《〈呐喊〉自序》等大量重要文章，以及徐志摩的散文、李健吾的小说等文学作品，该刊还重视对外国文学的介绍，编发过“摆仑

(拜伦)纪念号”、“纪念法郎士特号”，译介过莫泊桑、波特莱尔、欧·亨利、夏芝等人的作品，并且努力扶植了大批文学新人。

综上所述，现代文学传播制度之所以能在文研会这里得以发展，离不开发达的出版发行网络的支持。如果没有商务印书馆及开明书店遍布全国的出版发行网，《小说月报》、文研会系列丛书的成功难以想象，而如果不是在创建初期就附刊于拥有遍及全国发行网络的《时事新报》和《晨报》副刊进行发行，《文学旬刊》也不可能拥有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这种对基本机制保障的自觉寻求，也再次展现出文研会对现代传播制度建设的自觉意识。

注释

①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8页。

②杨扬：《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1）。

③杨扬：《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1998，459页。

④参见谢菊《转折时期的中国文学——1921—1931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博士论文）中相关论述，复旦大学陈鸣树教授指导，2002。

⑤徐雪筠等编译：《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173页。

⑥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83—184页。

⑦参见谢菊《转折时期的中国文学——1921—1931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博士论文）中相关论述，复旦大学陈鸣树教授指导，2002。

⑧杨扬：《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1998，284—285页。

⑨张元济：《张元济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799页。

⑩郑振铎：《本刊的回顾与我们今后的希望》，《郑振铎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466页。原载《时事新报·文学》第100期纪念号，1923年12月10日。

⑪它是创刊一年时，从第37期起标明为“文学研究会定期刊物之一”的，但以前人们对这一点都有共识，笔者注。

⑫雷世文：《现代报纸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程光炜编《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0页。

⑬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412页。原载《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1日。